

创新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周期中的作用

郭杨¹ 罗奔² 周宇³ 朱城甫^{4*}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2. 兰州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 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4.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键影响因素, 其作用机制与周期互动规律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 通过系统梳理文献与机制分析, 聚焦两大核心问题: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多层次路径, 以及创新与经济周期的互动机制。研究构建“微观(企业家精神与资源配置)-中观(产业结构升级与知识溢出)-宏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三级联动的创新驱动框架, 揭示了创新集群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内在关联, 阐明了创新在繁荣期(渐进式特征)与衰退期(颠覆性特征)的异质性表现, 以及中性与偏向性技术冲击的周期传导路径。研究发现, 创新通过多层次机制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且与经济周期形成双向互动, 技术冲击通过微观企业行为、中观产业关联与宏观经济变量的传导影响周期波动。基于此, 提出兼顾周期性调整与长期导向性的创新政策体系: 繁荣期侧重市场规范与知识产权保护, 衰退期强化颠覆性创新支持与要素集聚, 并从企业家精神培育、知识溢出激励、要素市场完善三个维度优化制度环境。本研究整合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碎片化机制, 深化了“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当代诠释, 为政策制定者实现长期增长与短期稳定的平衡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创新驱动; 经济周期; 三级联动机制; 创造性破坏; 技术冲击; 政策优化; 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结构升级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 创新已成为驱动增长、重塑产业格局的核心力量。从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以来, 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内在关联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1][11]}。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技术迭代周期缩短, 创新不仅深刻影响国家经济长期增长潜力, 更在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周期性波动中扮演着复杂角色。当前, 全球经济面临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调整与周期性波动叠加的多重挑战, 如何厘清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机制, 揭示其与经济周期的互动规律, 成为解决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聚焦两大核心问题: 创新通过何种路径推动经济长期发展? 创新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呈现何种特征, 其与周期波动的相互作用机制是什么?

(二)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系统梳理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与现代创新经济学的演进脉络, 整合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微观、中观与宏观机制, 弥补现有研究中机制分析碎片化的不足; 同时, 通过解析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双向互动关系, 深化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当代诠释, 丰富经济周期理论中技术冲击因素的分析框架。

2. 实践意义。

在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加剧、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本研究的结论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通过优化创新政策设计, 实现创新驱动增长与周期波动调控的协同推进, 助力经济在长

作者简介: 郭杨(2004-),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ESG。

罗奔(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地理科学。

周宇(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税收学。

通讯作者: 朱城甫(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商管理、创新发展。

期增长与短期稳定之间达成平衡。

3. 创新点。

其一，构建“微观、中观、宏观”三级联动的创新驱动机制分析框架，整合企业家精神、产业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逻辑；其二，聚焦创新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异质性表现，揭示创新集群与长周期波动的关联规律；其三，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提出兼具周期性适应性与长期导向性的创新政策体系。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开创性地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提出创新的五种核心形式：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法、培育新市场、获取新资源供应来源与组织改革。其核心观点在于，经济发展并非均衡的渐进过程，而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打破原有均衡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企业家通过整合生产要素、引入颠覆性技术与商业模式，瓦解传统经济结构并构建新的增长范式。1942年，熊彼特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强调创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更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演进的核心机制，为后续创新经济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石^[1]。

（二）创新与经济增长理论演进

古典增长理论虽未明确强调创新的作用，但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促进技术进步”思想已蕴含创新的雏形。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首次量化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内生增长理论（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则突破外生假设，将创新与知识积累纳入生产函数，强调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活动与知识溢出效应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内生驱动作用。现代创新经济学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视角，从单一技术创新延伸至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元维度，形成了“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的完整分析链条。

（三）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创新要素

经济周期理论对创新要素的关注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早期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侧重总需求波动，忽视技术与创新的作用；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学派则主要关注货币冲击与政策预期的影响。熊彼特首次将创新纳入周期理论分析，提出经济周期由创新浪潮驱动，不同强度的创新活动对应不同长度的周期（短周期、中周期与长周期）。后续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将技术冲击视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驱动因素，强调中性技术变化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而新凯恩斯主义则结合价格粘性等市场摩擦，分析技术冲击的传导机制与短期经济波动的关联。

（四）文献评述与研究缺口

现有研究已充分证实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动态面板数据研究还是区域经济分析，均验证了创新活动与经济表现的正向关联。在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方面，学者们发现创新在周期不同阶段呈现异质性特征，周期性行业的创新策略对周期波动更为敏感，衰退期的创新活动更倾向于长期增长导向。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点不足：一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多层机制缺乏系统性整合，微观主体行为与宏观增长效应之间的传导路径有待进一步厘清；二是对创新与长周期波动（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关联分析不够深入，创新集群的形成机制与周期演进的互动关系尚未明确；三是针对不同周期阶段的创新政策设计缺乏具体路径，政策的周期性调整与长期导向性如何平衡仍需探讨。本研究将围绕上述缺口展开深入分析。

三、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一）微观机制：企业家精神与资源配置

企业家精神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微观基础。熊彼特将企业家定义为“破坏性创新者”，其核心职能在于打破现有生产要素组合的均衡状态，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流程或新商业模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重组。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风险承担性，面对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的不确定性，企业家通过对潜在收益的预判进行创新性投资；二是机会识别能力，能够敏锐捕

捉市场需求缺口与技术进步潜力，将分散的知识与资源整合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成果^[6]。

从资源配置视角看，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推动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会吸引其他企业模仿与竞争，进而促进整个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家通过持续创新构建竞争壁垒，推动行业技术标准升级与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实证研究表明，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能够加速知识传播与创新扩散，进一步强化创新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3]。

（二）中观机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知识溢出

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动力，其作用通过“创造性破坏”过程实现：一方面，创新催生新兴产业，随着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新的生产部门与服务领域不断涌现，如数字经济时代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另一方面，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技术改造、流程优化等方式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与附加值，实现产业间的动态替代。这种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创新活动在产业间的扩散与渗透，表现为高附加值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不断进步。

知识溢出效应是创新在中观层面的重要传导机制。创新活动产生的知识具有非竞争性与部分排他性，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技术经验、管理方法等会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扩散：一是水平溢出，同行业公司通过模仿、人才流动等方式分享创新知识；二是垂直溢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合作研发、技术配套等形式形成知识传递；三是空间溢出，地理集聚的企业通过产业集群效应实现知识的快速传播。经济区域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集群中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

（三）宏观机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集中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生产效率的核心指标，反映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因素。创新通过两大路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技术进步效应，研发投入带来的技术创新直接提高生产过程的技术水平，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二是效率改善效应，创新推动的管理优化、组织变革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进一步放大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

从长期增长视角看，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递减会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停滞，而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能够抵消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指出，创新活动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能够持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形成“创新、生产率增长、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证实，创新活动对国家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是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因素^[5]。

四、创新与经济周期的互动关系

（一）创新集群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

熊彼特提出，经济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通常为50-60年）的形成与创新集群的出现密切相关。创新集群是指在特定时期内，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大技术创新集中涌现并产业化应用的现象，如18世纪的蒸汽机技术、19世纪的电力技术、20世纪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重大技术创新不仅自身具有颠覆性，还会引发上下游产业的连锁创新，形成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与产业升级浪潮^[4]。

创新集群驱动长周期演进的机制表现为四个阶段：一是孕育期，重大技术突破初步出现，市场应用前景尚不明确，经济增长处于低迷阶段；二是扩张期，核心技术逐步成熟并产业化，创新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经济进入繁荣期；三是成熟期，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递减，市场趋于饱和，创新活动从颠覆性创新转向渐进式创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四是衰退期，旧技术体系的增长潜力耗尽，新的重大技术突破尚未出现，经济陷入衰退，为下一轮创新集群的形成创造条件。历史数据表明，每一轮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更迭都与重大技术创新集群的出现同步，创新集群的生命周期决定了长周期的演进轨迹^[5]。

（二）不同周期阶段的创新特征

创新在经济周期的繁荣期与衰退期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繁荣期，市场需求旺盛，企业利润水平较高，创新活动更倾向于渐进式创新：一方面，企业更愿意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型创新，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并获取短期收益；另一方面，繁荣期的资源价格较高，企业倾向于通过效率提升型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巩固市场份额。这一阶段的创新具有市场化导向强、周期短、风险低的特点，创新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实际产出^[8]。

在衰退期，市场需求萎缩，企业利润下降，渐进式创新的动力减弱，但颠覆性创新的机会增加。此时，低效率企业被市场淘汰，释放出大量生产要素，为创新型企业提供了资源整合的契机；同时，企业为摆脱经营困境，更愿意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颠覆性创新，寻求新的增长路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特征：衰退期的创新活动集中在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领域，如核心技术研发、新商业模式探索等，这些创新活动虽然短期收益不明显，但为经济复苏与下一轮繁荣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熊彼特“衰退是创造性破坏时期”的论断^[7]。

（三）技术冲击的传导机制

技术冲击是连接创新与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纽带，其传导过程涉及微观企业行为、中观产业关联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多重互动。技术冲击分为中性技术冲击（提高整体生产效率）与偏向性技术冲击（对不同生产要素或产业产生差异化影响），两者对经济周期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

中性技术冲击的传导机制表现为：核心技术突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价格抢占市场份额，进而带动投资增加与就业扩大；消费端则因产品价格下降与收入增长提升消费需求，推动经济进入繁荣期。随着技术扩散与模仿行为的普及，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投资增速放缓，经济进入调整期。

偏向性技术冲击的传导机制更为复杂：一方面，对特定产业的技术冲击会通过产业链关联影响上下游行业，如新能源技术创新会带动光伏、风电等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储能设备、电力传输等相关产业的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偏向性技术冲击会改变要素需求结构，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此外，市场摩擦（如价格粘性、信息不对称）会延缓技术冲击的传导速度，导致短期经济波动加剧，而长期则会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增长潜力提升^[9]。

五、政策含义与实施路径

（一）创新政策的周期性调整

创新政策的设计需要兼顾经济周期波动与长期增长目标，根据不同周期阶段的创新特征进行动态调整。在经济繁荣期，政策重点应放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上：一方面，通过反垄断政策防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抑制创新；另一方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障创新企业的超额利润，激励渐进式创新与技术扩散。同时，应适度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发投入，避免繁荣期企业过度追求短期收益而忽视长期技术积累^[10]。

在经济衰退期，政策应侧重支持颠覆性创新与创新要素集聚：一是加大对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研发的财政投入，重点支持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二是实施税收优惠与金融支持政策，降低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成本，帮助企业在衰退期维持研发投入；三是建立创新要素流动的便利化机制，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向创新型企业与新兴产业集中。此外，衰退期应加强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通过技术改造补贴、产学研合作激励等政策，推动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的融合^[11]。

（二）制度环境优化建议

完善的制度环境是创新持续发生的重要保障，应从三个维度进行优化：一是构建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制度体系，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鼓励企业家的风险承担与创新行为；二是健全知识溢出的激励机制，完善产学研合作制度，建立技术转移平台，促进高校、科研机构的知识成果向企业转化；同时，通过专利许可、技术共享等机制，降低知识溢出的交易成本。

三是优化创新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打破要素流动的地域与行业壁垒，促进资本、人才等要素向高效率创新活动集中；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多元化融资渠道，为初创期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健全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吸引高端创新人才集聚。此外，

还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维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形成“创新、保护、再创新”的良性循环^[12]。

（三）国际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在创新政策与周期调控的协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美国的技术霸权战略与周期适应性政策，在经济繁荣期通过国防采购与民用技术研发结合，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在衰退期则通过《国家创新法案》等立法，加大对基础研究与新兴技术的投入，同时利用税收优惠激励企业研发。二是德国的“工业4.0”战略，通过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协同合作，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既强化了长期增长动力，又通过产业升级应对周期波动。三是日本的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注重在周期不同阶段平衡渐进式创新与颠覆性创新，繁荣期强调技术产业化与市场拓展，衰退期则加大对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同时通过中小企业创新支持政策，培育多元化创新主体。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建立创新政策的长效机制与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协同配合，既要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创新方向，又要依靠市场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同时，注重创新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形成调控合力，实现长期增长与短期稳定的双重目标^[9]。

六、结论与展望

（一）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系统探讨了创新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周期中的双重作用，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创新通过“微观、中观、宏观”三级联动机制驱动经济发展，微观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知识溢出放大创新效应，宏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保障长期经济增长；第二，创新与经济周期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创新集群的形成与演化驱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演进，而在短周期内，创新在繁荣期呈现渐进式特征，在衰退期偏向颠覆性特征；第三，技术冲击通过微观企业行为、中观产业关联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多重传导，成为连接创新与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纽带；第四，有效的创新政策需要兼顾周期性调整与长期导向性，通过制度环境优化与国际经验借鉴，能够强化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同时缓解周期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1.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了系统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机制框架，整合了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的分析，厘清了企业家精神、产业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的内在逻辑；二是深化了创新与经济周期的互动关系研究，揭示了创新集群与长周期的关联机制以及创新在不同周期阶段的异质性特征，丰富了经济周期理论中的技术冲击分析；三是拓展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当代内涵，验证了该理论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中的适用性。

2. 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一是创新政策应根据经济周期阶段动态调整，繁荣期侧重市场规范与知识产权保护，衰退期强化研发支持与要素集聚；二是制度环境优化应聚焦企业家精神培育、知识溢出激励与要素市场完善，为创新活动提供持续动力；三是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政府与市场协同的创新治理体系，实现创新驱动增长与周期波动调控的良性互动。这些政策建议对于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仍存在两点局限：一是缺乏对不同类型创新（如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经济周期中异质性表现的实证分析；二是对创新政策效果的评估缺乏量化研究，政策调整的具体阈值与实施效果的传导路径尚未明确。未来研究可从三个方向展开：第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创新在周期不同阶段的表现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第二，构建政策评估模型，量化不同周期阶段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明确政策调整的最优时机与力度；第三，结合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创新特征，探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创新与经济周期互动关系的新变化，

为应对全球经济新格局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 [1] Şerife Koç, Ramazan Uctu, Hassan Essop, Birol Mercan.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 using system GMM approac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Studies*, 2026, 10(1):20-30. <https://doi.org/10.1016/j.ijis.2025.09.003>.
- [2] Sascha Kraus, William McDowell, Domingo Enrique Ribeiro-Soriano, María Rodríguez-García. The Role of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21, 33(3-4):175-184. <https://doi.org/10.1080/22797254.2021.1872929>.
- [3] 李新, 刘浩, 张佳敏.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活力 —— 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生命周期视角的分析 [J]. *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 2025, 15 (07):80-86. <https://doi.org/10.16525/j.cnki.14-1362/n.2025.07.027>.
- [4] 李梦丹, 赵春艳. 经济周期视角下区域协同发展研究 —— 以西部地区为例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31 (02):69-84.
- [5] 王永钦, 褚浩男. 杠杆周期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抵押品结构的视角 [J]. *学术月刊*, 2025, 57 (02):35-55. <https://doi.org/10.19862/j.cnki.xsyk.001032>.
- [6] 王浩然, 周泽将. 经济周期波动与民营企业轻资产运营 [J]. *管理评论*, 2024, 36 (10):226-237. <https://doi.org/10.14120/j.cnki.cn11-5057/f.2024.10.006>.
- [7] 索寒蕾. 熊彼特悖论: 动态变迁过程中的静态均衡 [J]. *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4, (03):73-101.
- [8] 赵儒煜, 杨杨. 中国产业发展对周期理论的证伪与创新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4, (02):100-108.
- [9] 刘尧. 金融周期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研究 [J]. *中国集体经济*, 2024, (04):117-120.
- [10] 孙志超, 王涛, 郭慧文, 等. 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 [J]. *经济问题*, 2023, (07):77-86. <https://doi.org/10.16011/j.cnki.jjwt.2023.07.001>.
- [11] 陈正其. 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当代价值 [J]. *经济论坛*, 2023, (02):38-45.
- [12] 马永强, 阳丹, 巩亚林. 经济周期、政府扶持与企业创新 [J]. *会计研究*, 2022, (05):49-64.

The Role of Innov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ycles

GUO Yang¹, LUO Tao², ZHOU Yu³, ZHU Chengfu^{4*}

(1.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 2.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30, China; 3.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4.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 key influencing factor of economic cycle fluctuations,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cycle interaction law are the core issues in solv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lem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Schumpeter's innovation theory,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conomic cycle theory.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mechanism analysis, it focuses on two core issues: the multi-level path of innovation 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cycles. The study constructs an innovation driven framework with a three-level linkage of "micro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 meso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 macro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revealing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clusters and Kondratiev's long-term cycle, elucidat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prosperous period (progress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clining period (disruptiv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cyclical transmission paths of neutral and biased technological shock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nnovation drive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multi-level mechanisms and forms a two-way interaction with economic cycles. Technological shocks affect cyclical fluctuations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of micro firm behavior, meso industry linkages,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Based on this, an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that balances cyclical adjustments and long-term orientation is proposed: during the prosperous period, market norm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re emphasized, while during the declining period, disruptive innovation support and factor aggregation are strengthene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optimiz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ncentivizing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improving factor markets.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fragmented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deepens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policy makers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long-term growth and short-term stability.

Keywords: Innovation driven; Economic cycle Three level linkage mechanism; Creative destruction; Technological shock; Policy optimiz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